**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讲解词**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宾到长沙博物馆参观，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长沙古代史陈列展的入口，古代史共3个展厅，首先进入的是序厅。

**序厅：**

**左侧是一根中国历史的时间轴，下方标记了长沙的一些历史事件。**

长沙，被称为山水洲城、屈贾之乡。地形上，长沙位于湘江冲积的第二级阶地，城内海拔高度在35—45米左右。周围为地势较高的山丘。（北有留芳岭，东有陈家大山、龙伏山、回龙山，南有妙高峰、金盆岭等，其西面隔湘江、橘子洲与岳麓山相望。长沙城可谓四周山河环绕，天然地赐予了防御保护功能），既有利于防御，又有利于交通。它的名字与天上的星辰有关，大家可以张开双手触发互动，双手中将会呈现由星辰汇聚而成的长沙二字和长沙星。战国末期，二十八宿定名时，轸宿（古代称车箱底部后面的横木为“轸”。共八个星官，第一星官也叫“轸”，恰好位于朱雀的尾巴，又名天车）的第二星官就借用长沙的名字来命名。

好，我们一起穿越这浩瀚宇宙的时空隧道，走进二十万年前的长沙——湘江晨曦。

|  |  |
| --- | --- |
| **时间** | **事件** |
| 旧石器时代  20万年前 | **第一部分：湘江晨曦**  长沙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这是一组**浏阳市永安镇**出土的旧石器，这些石器出土于距今约20万年的网纹红土地层，是典型的***打制砾石石器***，说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已学会了制造工具。这批旧石器为砍砸器和尖状器，可以用于砍树、做木棒、砸坚果、挖掘根茎类植物等工作。 |
| 新石器时代 | **第二单元：农耕初兴**：  长沙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有了很大发展。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住在山洞里。新石器时代才从山区走向平原。这个时期，北方黄土高原的人发明了窑洞。 |
| 新石器早期  7000年前 | **第一组：大塘文化：**  1985年长沙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长沙县三兴村大塘组**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为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考古工作者将该遗址命名为**大塘遗址**。  这组器物是大塘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其中有用于农业生产的斧、镰、铲等，石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有所发展；有用来加工工具的石锛、石凿等；**石网坠**等工具则是用于狩猎。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有各种组合图案，少量陶器有红色或褐色彩绘图案，体现了大塘先民的审美情趣和原始宗教的风貌。  这件***带支座陶釜***是大塘文化中常见的一种炊器，主要用于烹饪食物和烧水。这三个支座保存完好，向我们展示了陶釜的使用方法，支座将陶釜支撑起来，底部空间则用以生火烹饪食物，是陶鼎的雏形。  **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特别丰富，其中这件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是新石器时期南方最精美的彩陶。陶罐陶质黄白，外施**白色陶衣**，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四出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昂首朝阳，嘴衔叶穗。彩绘纹饰精美，构思奇巧，反映了长沙先民对太阳和神鸟的崇拜，展现了大塘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陶罐使用了非常珍贵的白陶泥，用褐彩装饰了繁复优美的纹饰，表明它很可能是大塘先民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  这是大塘先民***崇拜太阳宗教仪式的场景***，大塘先民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中，对太阳的崇拜表现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太阳能够驱除黑暗和邪恶，是带来光明和生机的保护神。  大塘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反映在他们的彩陶图案中，这件***红色彩绘太阳放射纹饰口沿***，就是太阳崇拜的产物，口沿上的红色条纹是太阳的光芒，排列整齐、美观大方、非常珍贵。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装饰有太阳、飞鸟、植物等组合图案，反映了7000年前原始先民的生活景象。这件房屋纹陶器残片上刻划了许多类似***干栏式房屋***的图形（**类似吊脚楼，让房屋抬高，防洪水，防潮**），可以推测当时人类已告别原始洞穴，形成了干栏式建筑的聚居形态。这种建筑形式适宜居住，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像土家族吊脚楼就是这种类型的建筑。 |
| 新石器—  6500年至3000年前 | **第二组：聚落星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年代距今约6500年—3000年。  其中**腰塘遗址**位于长沙县冯家河东岸。1988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以及半地穴式房基遗迹。为年代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  我们在腰塘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为16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遗迹***，穴坑深约1米，门道呈斜坡状，近地面处有二级台阶。房基底部平整，地面上有陶片、碳化植物颗粒、鹿角等堆积物。半地穴式房屋建筑表明长沙先民已形成了稳定的聚落生活。  通柜中这件***釜形陶鼎***的造型与带支座陶釜非常相似，同样也是作为炊器使用，在底部生火制作熟食，它们的区别在于釜形陶鼎将底部的支座变为三细足与陶釜融为一体，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这也是后世铜鼎的雏形。 |
| 黄帝（约前2717年-前2599年） | **第三单元：上古传说**：  黄帝时期，黄帝和炎帝领导的华夏集团占据着黄河中下游，以今天河南新郑轩辕为中心的土地。黄帝的地盘比较大而且靠北，炎帝的地盘比较小而且靠南。蚩尤领导的九黎族东夷集团占据着黄河下游，今天山东省中南部。蚩尤姓姜，本是炎帝部落的后裔，黄帝命他造金属兵器。于是他的队伍变得强大起来，加上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较早进入农耕（粟粒，即小米）定居生活，利用宗教思想团结各部落，东夷集团开始向西扩张，与炎帝爆发第一次逐鹿之战，炎帝战败，向西北撤军，结果遭遇黄帝队伍，又打了一仗，称为阪泉之战，炎帝又败，归顺了黄帝。  蚩尤战胜炎帝后，就自称为炎帝，听说炎帝败给黄帝后，就打着为炎帝报仇的旗号与黄帝展开神话史上最激烈的战争，第二次逐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集团瓦解，一部分归顺黄帝，一部分向北逃窜，还有一部分向南逃窜。向北的最后也融入了华夏集团。向南的逃到江汉地区，征服了当地的苗蛮土著，重新组成三苗国（根据考古发掘，发现墓葬中有拔除侧门齿的）。三苗国的位置，左洞庭，右彭蠡（鄱阳湖），就是武汉以南、岳阳以东、九江以西，宜春以北，考古发掘以湖北屈家岭一代为主。 |
| 尧(约前2377-2259)  舜(约前2277- 2178) | 尧禅位于舜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流传最多的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尧的儿子丹朱不务正业，尧想了许多办法引导他都没有成功，比如，发明围棋来教导丹朱领兵征战。但是丹朱一心贪玩，不仅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还听信谗言想造反，夺帝位，结果被放逐到丹水，转而考察舜，发现舜的德行、能力都很出众，于是禅位了。但因为是禅让得帝位，所以舜又封丹朱为房侯。  另一个版本来自《三海经》和《竹书纪年》。传说，尧娶散宜氏女，生了丹朱（大儿子），尧晚年时，发生政治危机，以舜和益为首的东夷集团想篡夺帝位。于是舜就在尧的面前诽谤丹朱，并挑唆他将丹朱封到在丹水（今河南淅川），管理汉水流域的三苗。舜代理执政后，囚禁了尧，为了阻止丹朱了解真相还特意阻挠他来看望尧。之后，丹朱（在三苗称帝）率三苗之兵伐舜，在丹浦大战。有传说称丹朱的巨人部落首领夸父因误入大泽而死，失去了重要战力，相比之下舜还有以射箭闻名的后羿部落助阵，所以三苗被重创。  战败后的三苗，被放逐到崇山、三危两地。舜即位后，采取一面文德教化，一面分化的策略继续瓦解三苗。  丹朱在南方地区地位崇高，被湖南、广东等地奉为衡山皇、丹朱皇。所以舜又把他封到房地为诸侯。 |
| 禹 | 禹即位后彻底把三苗打垮了。三苗残余队伍迁徙于西南云、贵、广西一带。禹和三苗战争的期间，发生了几起大事：日食、大地震、洪水。这也是三苗被迫南迁的原因之一。也是大禹治水故事的来由。当时，大禹是带着大部队遭遇洪水的，因此他才有实力去治理洪水。有一位跟随他的将军叫做季连，他带领的部族就是治理荆江的主力，之后大禹定九州，就被大禹流在江汉之地的荆州。也就是后来的楚国。 |
| 禹王碑位于岳麓山巅的苍紫色石壁上，在蟒蛇洞南面。面东而立。碑文记述和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大禹继父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的美谈，流传至今。  岳麓禹王碑高1.7米，宽1.4米，碑文分9行，每行9字，计77字，末行空4字。其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很难辨认，很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箓，也有说是道士们伪造的。但远在1200多年前，即为韩愈（唐）所闻及，还亲登南岳岣嵝峰寻访禹碑，并留有诗记。即使是唐时的赝品，作为纪念大禹治水之丰碑，也是十分珍贵的。全国有十多处镌立禹碑，据说皆由岳麓禹碑模本复刻。 |
|  |  |

**第二部分：青铜之乡（商-西周）**

|  |  |
| --- | --- |
| **时间** | **事件** |
| 商 | **第一单元：商周南征**  中国历史上的商和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商王朝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倾力开疆拓土，商文化得以传播四方。根据文化遗存分布推测，位于江汉平原的盘龙城是当时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商人由此跨过长江，来到洞庭湖平原，进入长沙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将长沙历史引入了青铜时代。西周时期，周王朝多次南下征伐，周文化的影响也波及到了长沙地区。 |
|  | **这是一组商周青铜兵器**，其中这件**龙纹带斧铜刀**的形制非常特殊，斧的刃部比刀厚，劈砍时不容易折断。刀背上立斧，增加了刀的砍劈功能。整件器物可谓体现了湖南地区铸铜艺人的独具匠心。  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到长沙，是《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西周成王时期，诸侯贡献的方物-长沙鳖。 |
| 周 | 1963年，炭河里遗址被发现发掘，就是图上的这块扇形披萨。现存面积约20000平方米。原来是一整个圆，周围环水，便于防御。后来被洪水慢慢蚕食，变成现在这副模样。2001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三次科学发掘，于城址保存区西北部发现古代**城墙和壕沟，**是古代城址的重要防御设施，壕沟还具有排水功能。同时还发现了标志着国家文明初步形成的**宫殿基址**以及能够研究当时城中人员结构的重要资料**墓葬群**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遗物，而青铜器均为打碎后随葬，表现出独特的葬俗。炭河里城址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西周早期城址的首次发现，也是西周早期方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发现，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湖南乃至南方地区西周时期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  | **高砂脊遗址**,位于望城县高塘岭镇，是沩水入湘江河口的长条形沙洲，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1996年至1999年考古工作者对此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19座墓葬以及陶灶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其文化面貌与炭河里遗址十分接近，是炭河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址是西周时期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方国次中心。高砂脊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从其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分析，其中大部分应是本地铸造，极小部分直接来自中原。  炭河里很可能是古文献中屡次提到的西周南相候国。 |
|  |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人面方鼎**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古鼎。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整件器物很可能是稻谷收割之后举行祭天大典时，在鼎内盛满着稻谷。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则极为稀有珍贵。 宁乡发掘的**铜瓿**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瓿中体型最大的，重达61.9公斤，称为瓿王，在当时是一种酒器。铜瓿肩部有4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推测原本是铸接有4个牺首。现存铜瓿多为商、周遗物，战国以后的极少见到。 |
|  | 商周时期的大多数青铜器使用陶范法，并且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卣是一件盛酒器，盛行于商周时期。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会使用卣。这件**兽面纹提梁卣**，1971年浏阳县出土。腹部装饰一个兽面，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器物通体线条流畅而稳重大气，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精品。 |
|  | 考古发现，最早的觚型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云雷纹铜觚**造型为圆形细长身，喇叭形大口。商周时期的觚相当于酒杯，器身常饰有蚕纹、饕餮、蕉叶等纹饰。西周后期逐渐消失。 |
|  | （陶范法，一模一样成语）铙是长沙出土商代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长沙也是出土铜铙最多的地区（战争时鼓舞士气，宴飨时表演）。在礼乐盛行的时代，人们用珍贵的青铜礼器维护伦理和谐、尊卑有序，供奉先祖、鬼神，以及万物之灵。这套**乳钉纹编铙**共9件，由小到大造型一致，纹饰大体相同。铙体呈褐绿色，通体阴刻云雷纹，钲部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两面各有3排乳丁,每面18个。轻轻敲击它，便发出洪亮悠长的共鸣声。敲击铙的正鼓和侧鼓能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9件铙组合敲击时古代的五音俱全，可以演奏各种古乐曲，是目前我国最早能成编演奏的乐器。（口朝上，编钟是在其上发展而来。） |
|  |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公认为“中国电影大片时代里程碑”，而此前已经凭《卧虎藏龙》获得了第44届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大奖的旅美华人音乐家谭盾，负责了《英雄》的原声音乐。谭盾大胆采用了铙乐的元素，提升了电影古朴的质感。在电影画面中，乐师敲击编铙的情节，让旋律优美的铙乐响彻世界。 |
|  | 接下来您欣赏到的是，我馆镇馆之宝——[**象纹大铜铙**](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0316-GgCAC8LO65O_CSJ6TrKvc6b&url=http://baike.baidu.com/view/3036486.htm)。于1983年出土于宁乡县，重达221.5公斤。其中最为有趣的是燧部，装饰有一对扬起鼻子互相碰撞的小象。象纹饰出现在铜器上应是当时人对大象喜好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安详端庄的品格。我们长沙博物馆LOGO，也是由商代象纹大铜铙的形象转化而来。从外形上来看像两扇写意的门，分别取自于英文单词的“Museum”(博物馆)的首字母“M”和中文汉字中的门。两扇门，一进一出。一扇是穿越的门，馆藏文物从古代穿越到现代，告诉观众古代历史文化；另外一扇是感知历史的门，带领观众进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回看历史、感悟现代生活。 |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血脉的重要分支，湖南商、西周青铜器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先民的艺术才华和审美情趣的静态呈现，20世纪初以来，以**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续出土了以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为代表的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被学术界誉为“宁乡商周青铜器群”和“南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中心”。本世纪初，宁乡炭河里城址西周初期城墙、壕沟和宫殿基址等重大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存在发达的青铜文明方国（文献记载周成王时期，长沙诸侯国曾经进献过长沙特产——鳖）。这些在湘江流域发现的精美器物跨越了多个世纪，集中展示了湖南地区青铜文化从源起到鼎盛的过程。

三千多年前，原始居民、殷商后裔、西周子弟在三湘四水共同生息。他们交汇于群山环抱的黄材盆地，以水为池，择地为城，一座方国都邑从此崛起。尽管自然的力量几乎抚平了先人的足印，然而偶然的发现如石破天惊，开启了探寻方国踪迹序幕。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址？在城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城有多大？形状和布局又是如何？接下来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近**炭河里遗址**。

湖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宁乡最为集中。宁乡地区目前发现的铜器有400余件，因而有“宁乡青铜器群”之称。它们大多分布在距离炭河里遗址不远的山坡河畔，其用途可能与祭祀山川河流有关。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方面在器形、纹饰、铭文风格等许多方面表现出中原风格；另一方面有着相当浓郁的地方风格。两种风格的并存共生，构成了长沙地区商文化的独特面貌，反映了商文化南传过程中与本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第三部分：楚南重镇（春秋战国）**

**第一单元：百越杂处**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风云激荡，长沙地区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的一支——扬越则一直在长沙地区繁衍生息。因此长沙也被称为“扬越之地”（**春秋形势图**）。

古越人，断发文身，树木岭出土匕首。

越式鼎是越人生活的代表性器物，其造型一般为垂腹，细足，多饰绹索纹、蟠虺纹等,极具地方特色。

**第二单元：军事要垒**

春秋晚期，楚人来到长沙。由于长沙战略位置重要，长沙成为楚国往南拓展的重要据点。楚人在这里设县筑城，厉兵秣马，使长沙成为了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

**第一组：设县图治**

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地区共发现楚墓约3500座，这些墓葬规模较小，墓坑较窄，随葬器物以日用生活陶器为主，少见礼器，墓主身份一般为下层平民。

考古发掘出土的楚简及青铜器铭文中，多次见到“长沙”、“长沙公”的记载，说明楚人南下将长沙纳入政治版图后，设置了长沙县，并委派军政长官对长沙进行治理。长沙也从此时开始，成为湖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组：与越争雄**

战国初期，越国灭掉吴国，称雄于东南地区。南下扩张的楚国与谋求霸权的越国形成激烈冲突，双方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长沙地处楚越交锋的前沿阵地，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兵器，即是楚越争雄的物证。

我们面前这个庞大的剑阵就是当年战场频繁、兵器多样的缩影。

尤其是长沙东郊的张公岭楚墓，其墓葬中出土兵器的比例较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说明这些墓葬是戍守长沙东面门户的楚军墓葬，张公岭是当时长沙城外的一处戍所。

剑是古代最为常见的短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此处陈列的**战国带鞘铜短剑**，剑与剑鞘为一体，剑身较短，为防身短剑。剑脊凸起，自漆柄处逐渐向尖端收缩，并形成锐圆状剑锋。这件带鞘铜剑髹漆完整，光亮如新，形制较为特殊，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先秦兵器。

展柜中这套**战国铭文铜戈与错金银戈鐏**也颇具特色。戈为长兵器的一种，是车兵以及骑兵作战使用的格斗兵器，它能够在大范围内打击敌人。这件戈鐏，以错金银工艺装饰卷曲云纹，是错金银云纹戈鐏中的精品。戈鐏位于柲下方，它既是装饰，又能防止柲在地面过度磨损，还能在使用时准确把握戈的方向以及牢固地抓持。

旁边这件**战国菱形纹矛**为国家一级文物，整体呈柳叶形，通体饰菱形暗格纹，此类菱形纹装饰风格揭示了我国早在2500年前就已掌握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也就是表面合金技术。 **（器物任选一件）**

这些兵器和战车都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战争装备制造水平。

弓弩是来福枪的前身。

**第三组：营建城邑**

战国长沙城东起蔡锷路，西到下河街，南临坡子街，北至五一西路附件，为长方形格局。

由于战争频繁，当时的楚国也需要修筑城池来抵御越人的进攻。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区黄兴南路与蔡锷南路之间发现了一段城墙遗址，据考证是战国长沙城东城墙的一部分，这也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长沙已经修筑城池。战国长沙城的出现，标志着长沙城市发展的开端。

这里复原的**五一广场长沙古城地层剖面，**从下至上依次为战国、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文化层等。这也表明，五一广场周边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虽然历经两千余年，长沙的城市规模不断地壮大和扩展，城市中心却不曾变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明吉简王城墙，文夕大火。

**第三单元：经营开拓**

南下的楚人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特别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促进了长沙经济的发展。到战国中晚期，南楚境内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部重要的商业中心。

表格中所列举的这些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及牛耕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长沙农业的发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云“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生产力飞跃的另一个体现是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长沙成为楚国制造业的中心，这里陈列的**铜镜、玉器、琉璃器、漆木器**都是当时的代表性器物。

战国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长沙是楚国的铜镜铸造中心。楚式镜以铸工精巧、质地轻薄而著称。其中最为流行是山字镜，四山镜出土得最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草叶纹五山字镜**是其中罕有的珍品，到目前为止，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山镜仅有4枚。

就楚国的玉器来说，其具有形式多样，款式精致的特点，造型变得更加舒展，并且动感十足，主要体现在晚期龙凤造型的玉器上，动物栩栩如生，使玉器更富于灵性。纹饰方面，楚地玉器纹饰繁缛，一般会在空隙地方加刻綯索纹。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透雕龙凤纹玉佩**，为和田青玉制作，两面透雕连体龙凤，为战国玉雕之精品。左凤右龙。

此外，楚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琉璃器。琉璃器，也称料器，最早产于西亚和埃及。特别是这颗**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呈圆管状，通体呈绿色，中间有圆孔可以穿绳佩戴，器表突出30个半球形颗粒，颗粒底部饰白色圆圈，状似蜻蜓眼，该器物形体硕大，为同时期的琉璃珠中所罕见。经检测，这颗琉璃珠中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铅和钡，属于本地生产。

同时，战国也是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楚国的髹漆业在各国中最为发达的，先秦漆器以楚墓出土得最多。漆器多为王侯贵族所使用。其中更为有意趣的这件**漆虎子**，为溺（音“尿”）器或水器，其用整木雕成，形状似虎，尾反卷至头部形成提梁。器身线条流畅，形态生动，是国内所见最早的虎子之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蚁鼻钱**又叫鬼脸钱，是楚国特有的货币， “蚁鼻”即小钱的意思。另外，楚国在大宗商品交换时，需要使用切割成不同大小的黄金货币 “郢称”，天平和砝码就是称量货币的衡器。长沙是出土战国时期砝码最多的地区。砝码个数不等，最少的1个，最多的10个。成组砝码中每个重量不等，最大的约250克，最小的0.3克，10个一组的砝码总重量约500克。大量衡器的出现，体现了战国时期长沙地区工商业贸易的繁荣。

**第四单元：南楚风采**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随着民族的融合，楚文化不断吸收本地的越文化因素，形成了长沙“尊礼崇乐”与“好巫祈福”特色南楚文明。

**第一组：礼乐文明**

当然，最能体现礼乐制度的莫过于丧葬制度，葬制和礼器是古代王侯贵族身份等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尤其是对礼器中的鼎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平民不得使用礼器，也就是说“礼不下庶人”。

从中间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上至下，大体上是墓室规格越来越小，墓室结构越来越简单，棺椁数目和随葬品数目也逐级减少。青铜鼎一般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可以使用，平民一般只有少量而廉价的陶器随葬。细心的观众一定发现了，其中有一个楚墓没有遵循我说的这个规定，那就是荷花池一号墓。这个墓使用了两椁两棺，属于逾礼现象，也说明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已经出现。

这里复原的**浏城桥一号墓，**是长沙市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楚墓。同时，墓中出土的兵器达93件之多，占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一，还有车马器陪葬，推测墓主人是一位领兵作战的将军。

**第二组：信巫重祀**

此外，信巫重祀为楚国之大俗，楚人相信万物都有灵，认为人死后还存在一个 “神鬼世界”。

**虎座凤鸟架鼓**，全器造型逼真，彩绘绚丽，既是鼓乐，也是艺术佳作。这反映了楚人凤鸟崇拜、向往安详的观念和征服猛兽、不畏强暴的精神。

乐制是礼制的从属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将乐广泛地用于军事、宴享、祭祀、婚丧和外交等方面。南楚境内发现这些钟、鎛、琴、鼓等乐器，是南楚长沙地区尊礼崇乐的表现。

**第三组：简帛流芳**

楚国另外一个令后世叹为观止的艺术创造是简帛，这幅**战国子弹库楚墓缯书（复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其原件收藏于美国。帛书中13行文字的为《天象》，记录的是彗星等天象灾异；8行的为《四时》，记录的关于伏羲、炎帝等的上古传说，以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四周的12神图则与《月忌》中记录的12个月宜忌一致。

此外，在战国子弹库中还出土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张帛画**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复制）和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复制）**，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同时，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人物的刻画则被誉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197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两枚的《长沙楚墓人物帛画》特种邮票，足见这两幅帛画在国宝级文物中的地位。

长沙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楚汉名城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而屈贾之乡的文化赞誉则与两位文化名人密切相关，其中较早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屈原主张举贤授能，却因楚怀王听信谗言，而被诽谤排挤，流放至南楚境内，最后因悲愤在汨罗投江而死，这首《怀沙》就是屈原的绝笔之作。楚国百姓为了悼念屈原，将他去世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并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等风俗，屈原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